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 主编 于根元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主编 李维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于根元 主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于根元主编.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11

ISBN 7-5619-0424-X

I. 现… II. 于… III. 汉语-词典 IV. H164

H164
Y726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于根元 主编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1.375印张 1,110千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619-0424-X

H·291 定价:28.00元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1993 年第 2 号 (总第 3 号) 成果

说明：从 1992 年起，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一级和部分二级课题具有一定质量的成果，经所长批准，列入此编号。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于根元 主编

周洪波 刘一玲 张朝炳

宋孝才 程国富 凌 云

前 言

这本《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录了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1990年之间的语词性的新词新语新用法3710条。这是我们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我们同时还编写了《1991汉语新词语》《1992汉语新词语》。前面一本收录了335条，共7万来字，已于1992年10月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后面一本收录了448条，近9万字，于1993年9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此后每年出一个编年本，《1993汉语新词语》已经着手编写了。《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简缩之后的汉英本也已经交稿。

这本词典和编年本的收词范围，一是这段时间出现的；二是这段时间进入普通话的；三是这段时间进入许多人的语言生活的，如果过去有过，我们尽量注明；四是刚出现而我们认为会进入人们语言生活的，或者希望提请人们注意的；五是外国的而我们知道一下也好的。还有一些别的。

新词语自古就有。因为基本词语虽然相当稳定但是比较少，语言交际中往往不够用，尤其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尤其是表述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的时候。新词语同基本词语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行使关系密切而有区别的职能，共同为人们

的语言生活服务。新词语还是基本词语的来源。基本词语都曾经是新词语。语言的发展变化要看基本词语的变化,要看哪些词语隐退了,更要监测哪些词语显现了。及时监测新词语的显现,及时向人们介绍和推荐,是推动语言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工作。这在一些语言文字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已经进行多年了。

80年代初,整理和研究汉语新词语成了一个热门。一是词语本身是语言里活跃的部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思想更活跃了,出现了许多新词语,人们为了交际,需要了解和掌握。二是新中国建立初10年,汉语词汇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后来进展比较缓慢。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学者发现,大量的汉语新词语在许多方面比以前有所突破,又产生了研究的热情。三是世界上不少语言规范工作做得好的国家,新词语出现的情况掌握得相当清楚,甚至每年有一本帐。这也促使了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多花力气。

近10年来汉语新词新语新用法的研究,一开始是呼吁大家来关心,同时一些杂志报刊刊登一些札记性的词条。后来一下子出版了几十部词书。词书也由部分札记集录到相当全,到年代跨度大。近来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984年9月正式建立。此后不久,有关领导同志希望有人整理一下多年来的汉语新词语。1986年,我们有的同志着手在新词新语新用法方面做一些研究工作,摸一些情况,取得一些发言权。成果之一是1986年开始在《语文建设》上连载了“新词新语新用法”的一些样条。主观意图是突出语言应用,作些辨析、比较、预测。1991年3月,有关领导下决心让比较全面地整理新词语的课题上马。由

于根元主持“新词新语新用法”课题研究，周洪波、刘一玲为课题组成员。所外有张朝炳、宋孝才、程国富，凌云 1991 年底加入。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给了令人钦佩的支持。1992 年 8 月，大面上的工作结束，所外人员陆续离开。

我们在编写这本词典和编年本词书的时候，一方面学习了许多有关词书的长处，向闵家骥、韩敬体、李志江、刘向军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学习尤多，一方面坚持了 1986 年及后来几年在《语文建设》上发表的样条的特色。

尤其是这本多年本，我们注意了新词语变化发展的轨迹。例如喻指人才往东南沿海流动的“孔雀东南飞”，几乎在出现和使用的同时还有类似的“雁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比较站得住，而且出现了仿造它的“孔雀西北飞”“麻雀东南飞”。还注意了一些词语的关联，例如“导游”“导读”“导购”“导医”，“英语角”“恋爱角”“围棋角”“集邮角”等，在某一条里对这类结构作一个总的分析，我们把这样比较大的条叫母条，相关的叫子条。这样的分析，比较符合词语相互关联的事实，母条长了一些，但总的来说省了篇幅，给了读者更多的有联系的信息。上面这两点，总起来说，是注意了词书编辑与理论研究相互推进。

此外，我们几乎都引用了书证。新词语进入有质量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比较慢的。使用新词语，有关的文学作品不是快、多，而是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往往是情节和描写人物的需要，而且在这些作品里，往往是某些地方仿造新词语的临时的修辞用法比较密集。谌容的《献上一束夜来香》（《花城》1987 年第 1 期）是这方面的典型的作品。新词

语进入国家级大报，有一个时期也不那么快。我们作过调查，找新词语，外事版、理论版，极少。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古代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平实的散文里，也少。报告文学、杂文、新闻报道、座谈会发言里比较多，语言口语化的反映现代改革开放题材的作品里比较多。近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里相当多。大概有这样一个规律，思想活跃，语言活跃，形式活泼、贴近生活的文章里新词语比较多。新词语常常在地方报刊、小报和口语里活跃了一段时期之后才在大报上用开。所以我们尽量用文学作品、大报、大刊上的书证，但是也注意一般报刊、口语里的例证。我们觉得吕叔湘先生在《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里的一段批评是很深刻的：

为什么新词新义，特别是口语里的新词新义，没有受到编词典的人重视呢？我想到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西感兴趣，对生活中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不太感兴趣；对书斋中来的词汇比较敏感，对市场上来的，车间里来的，田野里来的就不那么敏感。找词语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一般报刊就不大理会，至于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

新词语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只要不是明显生造或者有其他明显不妥之处的，出现之后能用上几十年的，收。能用上几年，这几年没有它不方便的，收。眼看着很快要隐退的，有价值的要收。我们常常用“昙花一现”贬指风光一时的人和事物，其实还是需要人种昙花，种昙花者还是高明的花匠。昙花开时观者如云。流星、风，不值得注意吗？某个

流星、风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它一闪而过，而从宏观来说它是经常出现的有规律的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风在地面上留下的印迹往往长达数万年，流星掉到地面上成为陨石是博物馆的珍品。婴儿出生常常吉凶未卜，却牵扯着父母和多少人的心，刚生下来也不强壮，可是医生、父母、家人都精心养育。具体的某个孩子是否生得顺利，似乎无关大局，而从宏观总体来说，优生却事关重大。大人衣食无着的时候，当然顾不上这些，优生是社会发展的今天才引起人们关心的。国家衰败的时候，或者是花言巧语泛滥，或者是话说得好一些差一些没有多少人关心，今天大家关心新词语，是国家兴旺的标志。我们今天要重视优生，还要重视优死，近几年来我国发展了“临终关怀”事业。词语是如何隐退的，有什么条件和规律，也是今后我们语言学工作者应该关心的。特别是为我们服务得很好的词语，完成了任务，要隐退了，不能就忘记前情，要记下它们的功劳。

二

普通话新词语的出现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途径。

（一）从隐性到显性。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新词语用的时间长了用的人多了才能追认是规范的。它刚出现的时候，用的时间短用的人少，怎么办呢？当然是不规范的了，当然要批判。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也不完全是这么做的，他们对一些品位高的新词语，刚一出现就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对有些新词语也还是很宽容地观察一个时期的。后来有人干脆提出：一开始不要批判，可以观察一下，如果用开了，就承认它。那么这一类新词语起

初为什么还要叫它是不规范的呢？似乎换个叫法比较好。我们借鉴了王希杰要研究隐性语法的主张，1991年底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开始试着提出“待显词语”这一说法。待显词语既不同于已经为大家熟悉的词语，使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让人好懂。也不同于不规范的。后来我们改叫“初显词语”。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在过去一般说的词语的产生和消亡之外，提出了显现和隐退的说法。我们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一些词语从隐到初显，常常有高频率使用的需要，常常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或者比较松散的说法。可以说有一个孕育阶段。有的事物出现很久了，不需要特指的时候，没有专门的说法。有的事物还没有出现，词语已经走在前面了。有的词语如“大甩卖”，40来年不见了，现在又出来了，有的词语如“呼啦圈”“一刀切”“三角债”在使用中也有几乎中断好多年的情况。所以我们不采取用的时间长用的人多作为新词语规范的总的标准。“治穷”“打假”之类，我们并不希望它们寿命长，我们希望它们是寿命很短很短的短命词。可是它们现在在人们的语言生活里有用，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反映，它们在语言结构上有新东西，所以收。

（二）从方言吸取营养。

有北方话色彩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比较方便。其他方言色彩的词语如果字面上清楚的，进入也比较方便，否则往往要借助产品、电影等外力。近几年粤方言词语进入比较多，如“炒鱿鱼、电饭煲、发廊、焗油”，跟广东率先改革开放和许多措施、产品在全国传开有关。我们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方言色彩词语进入普通话的品位会高一些，传播得会顺利一些。

（三）一些修辞用法稳定下来成为新词语。

有的明显是修辞用法，有的明显是新词语，困难的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怎么界定。我们认为大概可以看两条，一是离开上下文意思比较稳定的，还能跟别的词语组合，有一定能产力的。例如“菜篮子”借指跟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基本的副食品供应，还出现了“保证菜篮子”“稳定菜篮子”“过问菜篮子”“大菜篮子”“菜篮子工程”等。二是已经作为蓝本被仿造的。

（四）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

很多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专门词语，进入语词性词语，例如：“启动”“软件”“含金量”“反馈”“反思”“辐射”“错位”等。不少简称，除了用字经济之外，还有不同的色彩，所以一些简称与全称长期共存就是这个道理。有的全称到简称分三级，例如“贫困地区”“贫困区”“贫区”。采用不少外来词语也有这个作用，用“的士”跟“出租汽车”，用“拜拜”跟“再见”，色彩不同。“小型”“微型”“袖珍”“迷你”，色彩不同。使用词语，表达意思要注意色彩和风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还有几个途径。例如标题，“感情产品”“三产”等一开始只在标题上用。作者编者立标题特别用心思，标题要吸引人，往往要新颖，而且字数不能多，所以标题里常常出现新词语。还如简称，还如外来的，还如专门术语来的。

普通话新词语的显现，原因和条件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合力造成的。从微观来说，例如“揭劣”，是由“揭短”“治劣”合力造成的，此后可以有“捉劣”。

新词语显现和推广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 在开放的、思想活跃的、贴近生活的领域里容易显现和推广。

(二) 有波及效应。如某某意识、某某热、某某效应，很快就推开。有的逐渐成了系列，如从“鞭打快牛”到“保护快牛”“鞭打慢牛”再到“保护快牛”“帮助慢牛”“促进中牛”“鞭打懒牛”。

(三) 多向影响。如口头—书面，雅—俗，现代化—传统化，文学作品—生活用语等。特别是科技、经济、日常生活用语的交叉，例如以“蛋糕”指财富，以“盘子”指计划，还有“内功”“外功”等。

有几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

(一) 所谓约定俗成。

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深入探讨。例如词语最早显现时的约定俗成跟后来组合显现时的有何异同；格式相同的为什么有的比较容易俗成，有的比较难，有的几乎不行；所谓稳定性，所谓“盖棺定论”，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还有词语跟事物、概念、色彩的关系；还有一个能不能预测的问题。这里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回顾一下我们不少文章、讲话叫停止用这个词语，“建议”“慎用”那个词语。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我认为‘一把手、二把手’的称呼应该停止使用。这个称呼泛滥在十年内乱时期，是帮派狂热、山头林立、极左思潮高涨情况下的产物。”（田春来《“一把手”等称呼不要再使用了》，《人民日报》1984年8月9日）近几年有人说：“不难忆起，‘小姐’‘卷土重来’的那些年，正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某些重大原则问题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年月。因此，建

议肩负着舆论导向重任的各种新闻媒介，尤其是在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广播节目中，在对大陆女性使用称谓时，还是慎用‘小姐’为好！”（方孜行《“小姐”辩》，《人民日报》1990年11月20日），这些主张者其实也是在“预测”。这些主张到底是“成功产品”，还是“失败产品”？

（二）社会历次大的变革，尤其随着引起思想文化领域变革的时候，都引起了词语的比较大的变化，新词语大量出现是一个方面，而且往往引起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和争论。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近几年新词语大量涌现，大概可以跟“五四”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有人欢迎新词语，说它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观念的变更。有人激烈反对，说看不懂了，等等。是否可以把词语本身和使用作一定的区分来讨论。使用要适度，一是必要，二是尽量让你的听者、读者能懂，三是考虑到你的听者、读者的心理承受力。

（三）加强动态的研究。除了注意词语发展之外，还注意一头——显现，另一头——隐退。注意语言本身的规律，还注意社会的心理。从几个方面区分词语的品位。如何确定新词语的品位，是一个很需要探讨的题目。如何提高新词语的品位，更是需要探讨的题目。我们过去常说：语文功底好的人比较能创造新词语。目前不少新词语的品位不够高，是人们被迫承认的，而不是人们很乐意接受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还有不少语文功底好的人在创造新词语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不够。这可能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语文功底缺乏动态的补充。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经常向古代的向外来的向群众的好的语言学习。尤其是向群众的好的语言学习。另外一个思想还要进一步开放，刚才说的努力向几个方面学习，也

跟思想开放有关。这大体上还是内因，还要有语体、语境等表述的需要这个外因。这一部分人为主来满足交际需要创造新词语，我们新词语的面貌和品位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四) 新词语和社会思想文化联系起来相互考察。例如汉人把许多非生理的不好的东西称作“病”，像“白眼病”“奖金病”“恐少症”，大概跟汉人担心和讨厌病的文化心态有关。还有“吃床铺”“吃床腿”“吃喝专员”“吃会”“吃公”，“科技副职”“科技家长”“科技户”“科技扶贫”“科技彩礼”“民办科技”，都反映了社会思想文化的问题和新的发展变化。

(五) 把新词语研究同语法修辞等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同语法研究结合，可以多探讨词汇语法范畴。同语用研究结合，多注意使用的适度和色彩。

三

我们的工作大致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学习和确定思路。我们请了曹先擢、韩敬体、王铁昆、李建国、刘洁修来座谈，我们仔细读了《汉语新词新义词典》。我们还检查了1986年起在《语文建设》上发表的样条。我们大致确定了突出语言应用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词典应该是资料加语言学功底加思想，要提高它的知识附加值和思想附加值，它主要是思想产品。我们从一开始工作，就确定每星期六上午专门讨论学术。我们大体上坚持了下来。我们想以学术研究带工作，引起大家对工作的兴趣，提高工作质量，同时注意学术研究。我们编卡片跟编词条同时进行，一开始就写了研究笔记，1991年底就写成了四篇论文。

困难的是资料等工作量太大。此外，一开头卡片和词目

废掉的也比较多，一种是1978年以前的词语，一种是临时修辞用法。这说明整理新词新语，需要熟悉过去的现在的语言生活，现在的又有书面的、口语的、方言的、外来的、各个层次的人的语言实际。还要知识面宽，起码对语法、修辞、社会语言学有比较多的了解。我们是在一面补课一面工作的。当然，我们也集思广益。例如1991和1992两个编年本交稿前，我们请李志江一条一条看过，这个本子也请他逐条看过。我们也很尊重责任编辑董树人的意见。好在我们还有几位水平很高的资料人员，有现代化的手段电子计算机，所领导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是在困难和支持中工作的，我们也在困难和支持中学习、进步。

了解这本《现代汉语新词词典》里许多词语的进一步发展变化，或者跟它有关联而出现的新的词语，建议读者读《1991 汉语新词语》《1992 汉语新词语》和此后每年一本的编年本。它们是成系列的。我们认为编年本更有价值。我们想到了2000年的时候，把这些整理一下，修改成收录年代为1978—2000年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修订本。

在这本词典和编年本里反映了我们的一些研究心得。比较系统的见解，在我们有关的论著里。我们这部词典交稿之后，想多用一些时间来做学术研究工作。我们还想通过新词语的研究，进一步探讨语言、语言学的本质，探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探讨科学的努力为人们语言生活服务的语言规范观，探讨风格问题，探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之后的语言观，等等。

我们这本词典和编年本都必定有误收、漏收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以进一步学习和做好工作的态度，请广大读者